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四)

费孝通

十三、欧战期间的派克老师

1917年4月6日派克老师正在芝加哥大学里准备社会学课程的教材，美国政府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的阵线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规模的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空前的。久处太平日子的住在美洲新大陆上的人们如梦初觉，海外战争从天而降。

这时成立未久的美国社会学会，通过它的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向130个社会科学家发出了一个通知，征求他们对在这个大战中社会科学应当做些什么的意见。派克老师趁这个机会发表了他对社会科学战后发展的方向的意见，也是他进入社会科学阵地之初的一项重要的对社会科学前途的表态。这里讲的话，在我看来至今还是适用的，尽管现在离第一次大战的结束已有近一个世纪了。他说：

“世界战争对社会科学不会不发生影响。原有传统的思想意识已受到震动，甚至已经动摇了。这似乎是件小事，但是在我看来传统分立的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在1918年春天前后将要彻底的崩溃了。

“过去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的问题，今后他们势将用相同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见解，而且可以取得相互理解。

“过去各学科的分立其实来自英国，并不是欧洲大陆传统。它继承了英国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自从工业兴起以来，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成了互相竞争的对立体。国际性的战争已改变了这种情势。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已不仅为保障个人间的自由，而要它实现社会的公平。这就引起了一大堆新问题……

“战后我们将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盲目地任自然力量的推动，而必须对历史的进程加以人力的控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首先必须理解这些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以上这段话，我觉得他明确地把社会科学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进程是客观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实体，社会科学是人们对这实体的理解。人们主观上的认识和人们生活在这其中的社会实体的关系说清楚了。派克老师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启示，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启发给人的一种自觉。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上而且为人们的生活做出指导，这样人们才开始作了历史的主人。这是对科学学的根本认识。也可以说是为社会学的功能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派克一向反对当时在美国社会学初期盛行的他称之为“做好事的学派”，就是把社会学的应用看成是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困惑，也就是一种社会服务的工作。这种看法来自一般传教的牧师，出于宣传宗教信仰或做些好事的慈善心理。在第一代美国的社会学者中受过这



种影响的人很多。这和派克“作历史的主人”的想法性质上是不同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上发生困惑时触动他的，不是慈善心理而是要求理解的科学态度。通过科学的理解去探索解决引起人们困惑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这是应用社会学和一般社会服务工作的区别。

世界大战不但启发了派克老师把他引导到了社会学功能的认识，而且实际上又把他带进了一个社会学的课题。这个课题一般称作“美国化的问题”（Americanization）。这个问题是发生于美国的历史。美国一向是，现在还是，世界上各地来的移民造成的。五百年前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大陆，还称作新大陆。嗣后几个世纪中，世界各地不断有人移居到这个新大陆上去，形成了后来称作北美合众国的一个现代国家。这段历史说明了美国人原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真正是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其中除来自非洲的黑人和来自中国的华人外大多是从欧洲大陆移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自德意志的移民据说有二千万人，分居在6500个地方聚居的移民区，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24个州里，有887个聚居区。波兰原籍的移民有1000个分支。这些人名义上当然是美国公民，即美国人，但是长期以同乡关系抱成一个团，和当地的其他美国人很少往来。这种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我自己在80年代访问加拿大时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住在多伦多附近的蒙特利尔市里，这是个法裔移民区，在街上如果用英语问路，常会遭到白眼，甚至有意误指方向。在那时美国情况似乎好一些。但在纽约市内有些街道还是黑人当道或是西班牙语的世界。美国流行的英语在这里还是吃不开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在我们中国，类似的事情是不易看到的。

但那种认同感或归属感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还是用我切身的体验来说，不久前为了看女足的决赛，我排除众议半夜起来看电视。在前后两个半场中，两队胜败不分，我也一直紧张地对荧屏，一刻不肯放松。最后门球入网，还是自慰地对自己说输得冤枉。这里正充分表示出我对国家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悠久的历史形成的，至今仍认为是十分可贵的。但在几十年前的美国人中，对所属国家美国的认同感，特别是在移民集团中，还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1914年美国在参加欧洲大战时，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心理上的归属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自己偏心于祖国呢还是在所在国，在这批人中自己还拿不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就成了一个极可忧虑的问题了。于是当时美国政府和一般社会上就提出了对这批归属问题上的动摇分子要加强他们对美国这个集体的认同感的要求，当时流行的名字就是Americanization，翻译起来也不太容易，说白了就是要消除移民及其后裔在归属心理上的动摇性，也就是加强美国公民对美国的向心力或称凝聚力。要使这些归属上的动摇分子不再感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

美国的移民历史造下了这个在参与世界大战时的人民心态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早已存在，但到美国宣布参战而且站到了协约国的一面和同盟国形成了敌对关系时，怎样处理那些原来从敌对阵营里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了。美国当时已声称是个民主国家，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又不能由政府独自决定，必须有群众性的舆论支持，为此需要对社会舆论有左右力量的学术权威的支持。因之当时就由经济巨头钢铁大王卡内基基金（Carnegie Fund）出面提供巨款，开展一个从1918年1月开始、1919年6月结束的“促进美国化的研究计划”。派克教授被卷进了这个研究计划。

重看从本节前面所引派克老师对战后社会科学的意见时，就可以理解当人们感觉到这个所谓“美国化”的问题时，他很自然地会做出参与这项研究的意向。客观上看，要找适当的人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自然地会找到派克老师的头上。



卡内基基金资助的美国化研究计划分为10个课题。计划主持人要求派克老师指导其中的一个关于“研究外文报纸”的课题。当时美国的移民社区用原籍语文出版的所谓外文报纸超过50多种，主要在芝加哥和纽约，1918年夏季派克从芝加哥的地方的一些外文报纸入手，到了秋季研究工作的中心迁至华盛顿，停战后不久又迁至纽约。在纽约时他又接管了这个计划的另一课题“移民传统的继承”，他利用这个机会圆了他的一件心事。

我在札记第十节里提到过派克和汤姆士的那段交情，汤姆士遭受不白之冤，辞去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职位，派克一直感激这位引他进入社会学阵地的人，并为他的遭遇抱不平。他接受卡内基基金研究计划时，就宁愿冒当时舆论的逆潮，特地起用汤姆士来协助他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芝加哥闹市的一家餐馆的楼上共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合作编写了一本《移民报纸和对它的控制》。

这两个社会学中的人杰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就想把移民的美国化问题扩充成美国移民社区的全面研究，他们的意向发表在1925年《美国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移民社区和移民报纸》里。

派克在对移民报纸的研究中体会到，欧洲大陆来的移民正处在一种转型的心态之中，他们首先要从狭隘的地方观点中挣扎出来，取得民族意识，有如过去的南洋华侨先要从地方帮派里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华侨一体的概念。从欧洲大陆移民北美的人们也要经过这类同的过程，从一个西西里地方的人（Sicilian）要经历一段变型才会认同于意大利这个民族的归属，承认自己是住在美国的意大利人（Italians）。从民族归属再进一步才能进入美国人的社会圈子里。因之用各自的本国文字来刊行的所谓“移民报纸”，是一个帮助移民进入美国化的台阶。派克实际上已触及到了民族的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他是在20世纪初期在美国碰到这个现实问题的，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由于他自己是记者出身，所以印象特别深的是移民办的报纸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各种移民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关于美国移民们自传式的报导，引起了派克老师的高度评价，甚至把这些材料看成是他所发现的“金矿”。他曾说“就是这种知识，而不是那种统计的数字给了我了解民族关系和人的本性的真知洞见。我回想自己的经历时，感到在纽约研究美国化问题的几个月里读到的那些犹太移民的自传性的文字给了我思想上革命性的启发。”

卡内基基金所支持的“美国化研究”，1918年1月开始进行了一年半，在研究工作尚未结束的1919年7月时世界大战却结束了。这时社会上对于移民的信赖程度问题已不再感到紧张了。这些研究的成果对了解美国实情的价值，事后来看是极为重大的，但是在当时，因触及了美国本质的要害，冒犯了包括卡内基基金在内的美国社会上层的利益，使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头了。基金会的董事会决定对这项研究计划进行重新审查，结果是认为“这10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地方需要大加改正和重写”。1923年负责出版的Harpers公司也声称这个系列的丛书销售下降，翌年又声称赔了本，1925年宣告停版。随后这项研究计划也无法继续下去。

派克老师接手的“移民传统的继承”这个课题，他已经及时和汤姆士和密勒一起写出了一份报告，名为《旧世界特点的移植》（Old World Traits Transplanted），1921年已出版。但这个报告的著者只标明是派克和密勒，汤姆士的名字被默默地注销了，而实际上这本书大部分是汤姆士动的笔。而且这个报告出版时，并没有按例请课题主持人写序。如果派克在这本书前写序，决不会抹煞汤姆士的名字，这事引起了汤姆士的极大不满。他已受过一次不公平的打击，失去了教授的地位。这次派克是有意要恢复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但又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派克和汤姆士的友谊上暂时又受到了一次袭击。派克对这件事又无力纠正，但是友谊上的裂痕为时并不长久。几年之



后派克又找到了恢复汤姆士学术地位的机会。1931年1月1日汤姆士给派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恢复了友谊。又隔20年，1951年这本《旧世界特点的移植》得到重版时，D. R. Young为该书写的序言里引用了当时“美国化研究”的主持人Brown的话，说明了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汤姆士的研究成果写成的，而且在重刊本上所标明的著者中汤姆士的名字列在首位。

“美国化的研究”尽管引起派克与汤姆士结合中的一段插曲，但这本他们合著的书的最后出版得到美国社会学界的赞赏，公认为“要写美国20世纪的历史不能缺少这一份研究报告”。

派克老师本人来说，他在走上讲台前的几年备课时期中又发现了一个发展社会学的“金矿”，就是提出了美国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而且他在这个课题的指导下，晚年又把这课题扩大到全球的民族接触和融合的前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在20世纪这正是要认真考验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大课题。

【学者论坛】

民族与国家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王铭铭

如果容许我用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20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

——费孝通（1998：2）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

——Marshall Sahlins（1998:10）

民族问题

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国内人类学界，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在30年代“边政学”提出以后，到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这一段复杂的历程中，得到了集中发展。迄今为至，国内人类学者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受到50年来历史特殊性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一般所谓“民族问题”的探讨上。“民族问题”虽然不排除“汉族问题”，但是显然更偏重指“少数民族”在国家民族事务的处理方面构成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属于一种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学界对于国家民族关系治理的介入。

